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鲍 威 尔 言 论

(供内部参考)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鲍 威 尔 言 论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 资料室 编
列 宁 斯 大 林

本书是供批判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请核对原文，并
在注明出处时用原稿版本。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鲍威尔言论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5印张 394,000字
1978年9月第1版 197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3002·194 定价 1.80元

内部发行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说 明

为了适应批判修正主义的需要，我们根据已收集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主要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著作，编选了这部丛书，按人或按专题分册出版，每册书都有编者加的前言、按语，并根据需要附有年表或其它参考资料。

材料的选择和编译，如有不妥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前 言

奥托·鲍威尔是第二国际和奥国社会民主党著名的机会主义领袖，是所谓“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这一修正主义派别的代表人物。本书编选的重点是他从1907年到1936年的主要著作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言论，此外也略涉及哲学和民族问题。

鲍威尔出身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人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富裕的商人和纺织厂主。鲍威尔在中学时开始接触马克思的著作，但同时也受到伯恩斯坦著作的影响。1902年，他进维也纳大学学法律，这时开始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代表人物鲁道夫·希法亭、卡尔·伦纳、麦克斯·阿德勒等结识，参加他们的理论活动和在工人学校中的教学工作。也是在这时，他加入了奥国社会民主党，不久就得到党的领袖维克多·阿德勒的赏识，并且由于向《新时代》投稿而开始和考茨基通信。

1906年，鲍威尔从大学毕业，为了取得律师资格在法院见习，但实际上已成为社会民主党的职业活动家。1907年他担任议会党团秘书，同年和伦纳、阿道夫·布劳恩一起创办党的理论刊物《斗争》月刊。维·阿德勒委托他写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书也在这一年作为《马克思研究》丛刊的第二卷出版。1912年起他担任党的机关报《工人报》负责与工会联系的编辑。由于这些活动，鲍威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成为奥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

动中的知名领袖之一，维·阿德勒甚至考虑让他接替自己担任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由于奥匈帝国政府停止议会活动，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未能在议会中对战争表示态度，但是他们实际上背叛了国际主义，采取和本国资产阶级合作的沙文主义立场。鲍威尔本人应征入伍，不久就在俄国前线被俘，二月革命后才被释放回国。1918年11月，奥国哈布斯堡王朝崩溃，奥地利共和国成立，鲍威尔曾在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内阁中担任外交部长和社会化委员会主席，1919年10月退出政府。鲍威尔在1919年当选为奥地利立宪国民议会的议员，从1920年起一直是国民会议员。他在这一时期参与制定和推行奥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路线，使奥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遭受严重损失。1934年奥国工人的反法西斯起义失败后，社会民主党被查禁，鲍威尔逃到捷克，1938年又逃到巴黎，不久病死。

鲍威尔的名字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分不开的。这一修正主义派别的代表人物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参加社会民主党活动的初期主要是进行理论研究工作。他们在二十世纪初年以《马克思研究》丛刊的名义出版了一些理论著作，并且在《斗争》月刊上不断发表文章，因而引起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注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一个美国社会主义者在一篇文章中第一次称他们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名称最初虽然主要是从地理上着眼的，但当它后来被沿用时就逐渐具有特定的政治内容。鲍威尔等人的理论工作各有侧重，他们各自在不同的领域提出一些代表性的修正主义观点，但这些观点从主要方面来说又是他们的共同财产。例如，他们在哲学上都主张用马赫主义和新康德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在经济理论上鼓吹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宣扬所谓的“民族文化自治”。“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派在

政治上基本上属于第二国际的中派，他们主张用社会改良代替社会革命，主张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惯于用革命的词句掩盖机会主义的实质，特别是用他们的这些修正主义理论来为机会主义的路线和策略辩护，因此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派的这些理论和策略观点在奥国社会民主党内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大战以后，由于鲍威尔、伦纳、弗·阿德勒等人成为奥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袖，他们的观点也随之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因此可以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一词已成了奥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和政治路线的同义语。这一修正主义流派的严重危害也是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就鲍威尔个人来说，他早年是“民族文化自治”谬论的主要鼓吹者，曾因此受到列宁和斯大林的尖锐批判，但在他的整个一生中，危害最大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在奥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而这正是我们在批判“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这一修正主义派别时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书编选的重点也在于此。

二

鲍威尔和第二国际许多机会主义领袖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社会主义运动和平发展的年代曾经侈谈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例如，1913年11月，鲍威尔在一篇文章中把无产阶级革命描绘成一个“大规模的国际战争、流血的阶级斗争的时代”，“在这一时代里，老的国家将消失，新的国家将产生，所有国家的国家体制都将发生变化。它的结果将是完全的民主，资产阶级的垮台，无产阶级的专政，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这一社会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①

^① 《我们的策略的基本问题》。见《斗争》杂志第7卷（1913年）第62页。

说得多么好听啊！但是，四年之后，当十月革命的炮声真正宣告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开始时，鲍威尔却把这些豪言壮语忘得一干二净，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浸透着小资产者思想的书呆子的典型。他在战前曾经写过一些有益的学术著作和论文，曾在‘理论上’假定，阶级斗争能够尖锐到发生国内战争的程度。……但是，当无产阶级革命真正到来的时候，他的书呆子习气和庸人的天性就占了上风，他惊慌起来了，开始用改良主义词句这种油来淹涵涌澎湃的革命。”^①

二月革命以后，鲍威尔站在孟什维克的反动立场，认为俄国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能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鲍威尔攻击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鼓吹资本主义复辟。鲍威尔制造了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来为自己的反动立场辩护。随着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这些谬论在形式上有所变化，但实质始终不变。

第二国际时期各国社会民主党曾经有过一个公认的论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是要无产阶级占人口的多数，因此在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无产阶级还没有占多数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鲍威尔和考茨基一样，把这一论点奉为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拿来当作反对十月革命的主要论据。其实，马克思早在1856年就曾经讲过：“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②对于马克思的这个指示，他们完全不了解。他们更不了解，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由于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社会主义革命不一定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而首先会在资本主义阵线比较薄弱、无产阶级比较容易冲破这一阵线的国家取得胜利。

^① 《列宁全集》第30卷第32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8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由于战争严重削弱了沙皇统治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在俄国已出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同农民运动相结合的形势，俄国又有强大的布尔什维克党。列宁正是根据对帝国主义发展规律的科学分析，根据对俄国形势的透彻了解，创造性地制定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证明列宁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鲍威尔却仍旧喋喋不休地说什么俄国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无产阶级没有占人口多数，因此革命必然要失败，如此等等。这正如列宁所说的：“他们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窍不通的。”^①

鲍威尔反对十月革命的另一个反动观点是所谓“一般民主”。他抹杀民主的阶级性质，否认资产阶级民主制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美化成为“全民的”民主制度。鲍威尔把这一观点同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前提的观点联系起来，得出结论说：当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到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时，无产阶级就可以通过民主手段即通过选举取得政权；反之，如果无产阶级还不占人口多数，即使用暴力取得政权，也无法维持下去。鲍威尔的这一观点同考茨基之流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表述方式上却有独特之处，这就是他的臭名昭著的“社会力量因素”论。

鲍威尔认为，各个阶级的“社会力量因素”有五个，即1、阶级成员的人数；2、组织性；3、在生产和分配中所占的地位；4、阶级的积极性；5、阶级所受的教育。在民主制国家里，政治权力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是由“社会力量因素”的大小来决定的；在不民主的、专制的国家里，权力的分配不是按照社会力量因素，而是依靠物质暴力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9页。

手段，主要是靠武装部队决定的。因此，在不民主的国家，统治阶级凭借暴力享有的权力比它按其社会力量因素应享的权力要大得多，其他阶级享有的权力比应享的要小得多。鲍威尔根据这一观点，攻击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力量因素“横施暴力”，是俄国经济落后和政治落后的产物。鲍威尔认为，在西欧和中欧的“民主国家”，无产阶级不需要象俄国那样举行暴力革命，而应该等待自己的社会力量因素增长到超过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因素，那时就可以用民主手段夺取政权。

鲍威尔鼓吹社会主义的所谓客观经济前提，或者鼓吹所谓的社会力量因素，既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实行和平过渡，也是为了论证苏俄必须复辟资本主义。在鲍威尔看来，既然无产阶级专政是俄国经济和政治落后的产物，那么随着苏俄经济建设的发展，专政就要逐步为民主所代替，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就要逐步蜕化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因此，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每前进一步，鲍威尔就要把他的这一反动观点拿出来，当然在形式上每次都有所不同。例如，当苏俄国内战争结束，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时，鲍威尔根本不认为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一种方式，是为了更好地向资产阶级进攻而实行的暂时退却，却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是“重建”资本主义经济，由此也必然会导致逐步废除无产阶级专政，恢复资产阶级民主制。又如，当苏联在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取得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伟大成就时，鲍威尔不能看到这些成就正是无产阶级专政发挥组织经济职能的结果，又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他却反而错误地得出结论，竟以为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发展会促使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资产阶级民主制。鲍威尔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复宣扬类似的观点，充分说明其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顽固性。

鲍威尔和考茨基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就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交换意见，他们的看法实质上是一致的，但也有些差别。这主要表现在：考茨基根本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是马克思偶然使用过的一个词，而鲍威尔却认为，从理论上说来，应当承认在一定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鲍威尔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通过民主方式和平夺取政权，但是如果资产阶级采取暴力破坏民主制，无产阶级就只好使用暴力；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如果资产阶级用暴力进行反抗，无产阶级也就只好用暴力镇压，以保卫自己的政权。总之，无产阶级无论为夺取政权还是为保卫政权而使用暴力，都是迫不得已的，因此鲍威尔称之为“防御性暴力”。鲍威尔曾经努力把无产阶级“专政”和“防御性暴力”的提法写进由他起草并且经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26年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林茨纲领）中，从而使奥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抹上了一点革命色彩，显得与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有些不一样，但是鲍威尔等人在奥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行动恰恰证明这些“革命”的词句完全是供装点门面的，它们只不过进一步说明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三节里还要谈到。

鲍威尔对待苏维埃俄国的态度在形式上也同考茨基的态度有所区别。在苏俄建国初期，鲍威尔同考茨基唱一个调子，恶毒咒骂它“必然要垮台”，并且吹捧考茨基攻击苏俄的反动著作《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本“人人必读的书”。但是鲍威尔考虑到当时奥国和欧洲各国工人阶级对苏俄的向往，不主张对布尔什维克进行过多的露骨的攻击，而强调从“理论上”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妄图以此摧毁工人阶级的信念，同时避免引起工人群众对社会民主党的怀疑。就这一点来讲，鲍威尔可以说比考茨基更加狡猾。在苏联的革命和经济建设的成就日益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

时，考茨基仍旧恶毒地毁谤苏联，甚至公开号召苏联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鲍威尔却不同意这种做法，而是如上面所述，把希望放在无产阶级专政逐渐蜕化成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可能性上。鲍威尔有时甚至能承认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但是这种“歌颂”总是同对所谓“民主化”即复辟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期望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尽管鲍威尔在私人通信和文章中都曾经同考茨基进行过争论，但是在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而代之以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一根本问题上，两人没有本质上的分歧。列宁在1919年曾经这样描绘他们：“哈阿兹、考茨基、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和奥托·鲍威尔尽可无休止地兜圈子，连篇累牍地写文章，无止境地发表演说，但怎样也避不开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实际上暴露出自己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一窍不通，他们实际上是市侩民主派，……他们实际上在好的场合是资产阶级手中的玩物，在坏的场合则是直接替资产阶级效命的奴才。”^①应当说，列宁对鲍威尔的这一评价对鲍威尔的一生都是适用的。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苏修叛徒集团抓住鲍威尔的某些革命的词句大做文章，企图为他翻案。1960年7月，赫鲁晓夫在访问奥地利时对奥国工会联合会代表们的一次讲话中赞扬鲍威尔，说他“在自己晚年终于有了勇气和意志力来正视事实，并对事实作出正确的评价”。勃列日涅夫集团上台后，竟在1969年的所谓《纪念列宁诞生一百周年提纲》中明目张胆地把鲍威尔关于“社会力量因素”的谬论冒充为列宁的观点。接着，在1970年出版的第三版苏联大百科全书按照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定下的调子，吹捧鲍威尔和奥国社会民主党其他领导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无论在理论观点上，或者在实际政策上都有别于国际社会民主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6页。

党的右翼”，肯定林茨纲领在理论上承认了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吹捧鲍威尔在自己的晚年“开始走上了改正自己某些改良主义观点的道路。”上述事实说明，苏修叛徒集团和鲍威尔有着共同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往鲍威尔脸上贴金，甚至把鲍威尔的观点冒充为列宁主义，也就毫不奇怪了。

三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鲍威尔作为奥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袖，在担任政府官职时，在议会活动和党的工作中，充当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屡次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生死搏斗的关键时刻叛卖革命，并且发表了大量言论，制造出种种谬论，来为自己和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背叛行为辩护。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奥匈帝国多民族国家崩溃，奥地利出现了大好的革命形势。旧的军队瓦解了，士兵苏维埃和工人苏维埃纷纷成立，工人不断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战争和推翻君主制度。1918年11月，哈布斯堡王室被迫退位，奥地利共和国成立。奥国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政党一起组织了联合政府。同俄国在二月革命以后一样，奥国也出现了政权归资产阶级还是归无产阶级的问题。列宁指出：“显然，现在不论在德国或奥地利，革命的主要问题都是这个问题：是立宪会议呢，还是苏维埃政权？”^①

当时，奥地利的邻邦匈牙利（1919年3月）和德国的巴伐利亚州（1919年4月）已先后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奥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左派和新建立的奥国共产党也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10页。

号,要求在奥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在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但是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袖同资产阶级以及协约国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利用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和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出卖革命,做到了孟什维克在俄国没有做到的事情。

社会民主党领袖破坏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段是阻止苏维埃转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机关。他们依靠在许多地方的苏维埃和苏维埃代表会议中占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员,通过党和工会的官僚掌握了苏维埃的领导权,逐渐把苏维埃降低成贯彻政府和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意图的附属机构。另一方面,他们积极帮助资产阶级建立新的雇佣军队即“国民军”,并把它打扮成人民的军队,以此为资本来反对成立真正的工人武装部队。实际上,这支军队的指挥人员全部是从奥匈帝国的旧军官中任命的,士兵苏维埃形同虚设,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和有革命情绪的士兵陆续被清洗,因此它基本上是为保卫和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袖还同意和支持警察机构逮捕共产党人、镇压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的工人。在对外政策上,他们对协约国帝国主义卑躬屈膝,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则拒绝给予援助,反而同协约国政府相勾结,把武器通过意大利政府交给正在对匈牙利进行干涉的捷克军队,从而参加了扼杀新生的匈牙利共和国的罪行。社会民主党的这些叛卖活动,鲍威尔或者参与策划,或者直接主持。不仅如此,他作为党的理论家还炮制了一系列反动谬论来为之辩护。

鲍威尔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地宣扬奥地利特殊论,认为奥地利是一个小国,在战争以后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必须依靠协约国的粮食和贷款才能维持,奥国的工人也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因此奥国工人如果用革命手段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就一定会引起内战和外国干涉,也一定要失败。鲍威尔还篡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捏造出一个所谓的“阶级力量均势”国家的理论,胡说当时的

奥地利共和国属于这一类型，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已不能单独掌权，无产阶级也还不能单独掌权，二者保持均势。鲍威尔企图这样来否认奥地利共和国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并且为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合作制造论据。鲍威尔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奥国工人阶级既没有能力用暴力打碎国家机器，也没有必要用暴力打碎国家机器，只要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走上“到社会主义之路”就行了。鲍威尔利用自己的“社会化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散布改良主义的社会化理论，主张通过征收累进财产税和累进所得税来“毫无痛苦地”完成剥夺资本家的过程，他把这种做法定为“社会化”的主要措施，并且制定法律，提交议会通过，大吹大擂，一时好不热闹。但是这个“社会化委员会”没有做任何实际工作，那些法律从来没有实行，革命高潮一过，委员会就完全停止活动了。鲍威尔在这一时期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只是起了粉饰资产阶级专政、麻痹和欺骗工人群众的作用。

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叛卖，同时也由于共产党力量薄弱和策略上有错误，奥国工人的革命斗争屡次遭到挫折。1919年8月，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那里出现了白色恐怖；奥国资产阶级也加紧向工人阶级进攻。1920年10月，奥地利共和国宪法通过，资产阶级的统治稳固地确定下来。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兴起的奥地利革命高潮就这样被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的联合势力打下去了。

1918年到1920年的奥国革命高潮过后，奥国社会民主党于1920年退出政府，以全力进行合法斗争和改良活动。到1926年11月林茨代表大会时它可以说已达到“极盛”时期：党员六十万，占人口十分之一；选票一百五十万，占全体票数五分之二；社会民主党在维也纳市政府长期执政，为工人举办了一些福利事业，社会民主党领导就把这一点当作政治资本，大事吹嘘，甚至狂妄地自称“红色

维也纳”。这时，鲍威尔已经陶醉在和平过渡的美梦中了。鲍威尔作为林茨纲领的主要起草人，在林茨代表大会上两次作长篇发言，并且作了结束语。他扬扬得意地说：“奥国工人阶级在1918年革命以后固然被迫后退，……但是并没有象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那样被战胜，被真正打败，也就是说，同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比起来，奥国工人阶级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实力地位。”因此他认为，对于奥国工人阶级来说，“夺取政权已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而是一项任务，我们可以把它作为这一代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直接给自己提出来”。鲍威尔声称，党纲的基本思想就是要说明，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已不再仅仅是发展趋势，而是同时也是党的战略任务”^①。那么，社会民主党应当怎样来实现这一任务呢？鲍威尔在1924年发表的小册子《取得政权的斗争》中已经作了回答：按照宪法，通过选举，依靠取得大多数选票来取得政权。

不过，上面所说的和平过渡的言论仅仅是鲍威尔当时言论的一个方面。如果鲍威尔只是一味鼓吹和平过渡，那么他作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特点就无从表现了。必须指出，正是在《取得政权的斗争》这本书里，正是在林茨大会上的发言和林茨纲领里，鲍威尔提出和发挥了他的防御性暴力思想。关于这一思想的内容，本文第二节里已经作了概括的介绍，我们在这里要结合鲍威尔和奥国社会民主党在这一时期的实际行动，进一步揭露这一思想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法西斯势力已在欧洲抬头。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举行政变，夺取了政权。在这以后，德国垄断资产阶级也开始利用法西斯势力镇压工人运动。在奥国，法西斯组织

^① 以上引文见《奥国社会民主党1926年代表大会记录》第255页，转引自奥托·莱希特利《奥托·鲍威尔。是悲剧还是胜利？》1970年维也纳德文版第180页。

纷纷出现，它们或者同德国法西斯、或者同意大利法西斯相勾结。不断向工人阶级挑衅，杀害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引起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愤怒和警惕。奥国共产党已经向工人阶级发出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号召。在这一形势下，社会民主党领导不得不进一步玩弄欺骗手段，于是防御性暴力的思想就出笼了。不仅如此，社会民主党从1923年2月起开始在工人中建立“共和国保卫同盟”。这个人数最多时达到十万人的工人武装组织，表面上是一个反法西斯的战斗组织，但是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主要只是起在工人罢工和示威时维持纪律的作用，因此社会民主党利用这一组织形式可以把工人群众的反法西斯斗争控制在它所需要的范围内。由于采取了这些欺骗措施，社会民主党领导在工人群众中继续保持较大的影响，因此在1927年4月的国会选举中取得了历史上最多的票数。而且它所造成的革命的假象，也曾使资产阶级产生过一些疑惧。例如，基督教社会党的机关报在1927年说：“（奥国）社会民主党表现出来的一个两面神头像：它用一个脸关心防止内战和保卫共和国，另一个脸却充满了不祥的激情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冲动。”这家报纸问道：“究竟哪一个是它的真面目呢？”^①一个被社会民主党开除出党的极右分子甚至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奥地利布尔什维主义”^②。这类言过其实的评价一时固然能帮助奥国社会民主党增加它的欺骗性，但很快就被鲍威尔之流的实际行动证明为完全多余的忧虑。正如一位研究法西斯主义历史的学者所指出的，奥国资产阶级往往“在实际上只不过站在吉伦特派的地方看到戴着红帽子的雅各宾派”。^③

① 《国家报》1927年7月20日，转引自诺贝尔特·莱泽尔《在改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1968年维也纳德文版第180页。

② 转引自同上书第181页。

③ 转引自同上书第188页。